

# 晚商文化在东方的进退及影响

李晓健 豆海锋

关键词：晚商文化 东方地区 陶器 商夷关系

KEYWORDS: Late Shang Culture Eastern Region Pottery Shang-Yi Relation

**ABSTRAC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reexamination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the paper undertakes an analysis of the late Shang culture's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 With a focus o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pottery, and by comparing changes in the influence of late Shang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late Shang culture underwent a contraction both spatially and in terms of its cultural influe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he eastern region by the Shang Dynasty,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ern Lu region, laid a foundation for access to salt resources in the area. However, i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ang and Yi. Meanwhile, the rise of distin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ollowing the eastern migration of clans and lineages indirectly l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weakening of the power of the late Shang cultural center at Yinxu.

考古学文化的进退往往意味着该文化的强势与否，折射着背后人群、国家的盛衰，因此考古学文化进退研究对于准确认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意义。商作为三代文明之一，也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点时期之一；但相较于晚商文化在北方、西方、南方的退缩<sup>[1]</sup>，其在东方的进退尚需进一步探讨。

商文化的东方地区大致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包括临近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沧州等地。徐基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时到达山东西部，晚商时拓展到青州、寿光一带，形成“东渐”势头<sup>[2]</sup>。张国硕将“东渐”过程细化为停滞期、发展期、全盛期三段<sup>[3]</sup>。之后，学者对商文化在早中商时进入海岱腹地、殷墟时到达胶莱平原及黄海之滨的“东进”认识逐步统一<sup>[4]</sup>。

随着材料增多，学者发现商文化在殷墟时期并非一直处于东扩的状态，甚至还存在收缩的态势。曹斌认为殷墟三、四期时鲁南地区晚商文化分布明显收缩<sup>[5]</sup>；刘绪认为晚商时期商文化在东方发展势头强盛，在东南方则已退缩<sup>[6]</sup>；燕生东认为在殷墟一期后段到殷墟三期前段商文化东界北部、中南部存在退缩<sup>[7]</sup>。由于使用材料不同、分期细化程度不同，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分歧，晚商文化收缩的原因与性质也有待深入剖析。

邹衡先将殷墟文化划分为四期七组<sup>[8]</sup>，后来将最早的1组归入早商文化晚期的范围<sup>[9]</sup>，其余三期六组归为晚商文化。邹衡所划分殷墟文化最早的1组大致相当于王立新所划分早商文化第三期第6组<sup>[10]</sup>和唐际根所划分中商三期<sup>[11]</sup>。基于学界多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时空间范围达到最大，早商文

作者：李晓健、豆海锋，西安市，710127，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化三期（即中商二、三期）保持了这种发展势头，因而本文所指殷墟一期<sup>[12]</sup>包含早商文化第三期第6组或中商三期；本文所指的晚商文化与邹衡所言殷墟文化（包含最早的1组）一致，年代范围为盘庚迁殷到商末周初。

## 一、晚商文化在东方的分布态势

目前新材料的刊布、新研究认识的提出，为我们探讨晚商文化在东方的进退提供了新的基础。我们将晚商文化在东方的分布边界分为北（即鲁北及沧州一带）、中（即鲁东南一带）、南（即苏北及皖中北一带）三部分，分别进行考察。

盐业考古的深入使学界对晚商文化在东方北部的推进有了新的认识<sup>[13]</sup>。从陶器分布看，早商文化影响范围相当广泛，且一直延续到殷墟一期。沧州孟村高尧庄<sup>[14]</sup>所出及阳信李屋H42：1<sup>[15]</sup>陶鬲器形瘦高，折沿方唇，弧腹略垂，高分裆，大锥状实足根，是殷墟一期典型器形。滨州滨城区兰家BLSZ：1<sup>[16]</sup>，邹平丁公J1：4、5<sup>[17]</sup>，桓台前埠H104：1、2，H129：4、J2⑤：10，桓台唐山H122③：1<sup>[18]</sup>，这几件陶鬲为折沿，弧腹略垂，分裆变矮，锥状实足根变小，器高变矮，年代大致为殷墟一期偏晚。此外，沧州孟村高尧庄、倪杨屯<sup>[19]</sup>及滨州滨城区卧佛台出土陶鬲残件锥状实足根较大；沧州倪杨屯所出及阳信李屋H45：01假腹豆残器，同样显示各遗存可以早到殷墟一、二期。

燕生东曾将黄河三角洲与莱州湾沿岸地区咸淡水分界线两侧遗址划分为沿海盐业遗址、盐业遗址群内侧聚落、内陆腹地聚落三个聚落群<sup>[20]</sup>。盐业遗址群内侧聚落群的分布与咸淡水分界线基本重合，在聚落中盐业器具盃形器与生活日用器大致各占50%，如阳信李屋遗址、滨城区兰家遗址等<sup>[21]</sup>。以这些遗址陶器为线索，可以构建起盃形器与日用

陶器详细的分期体系及对应关系<sup>[22]</sup>。经燕生东研究，黄河三角洲、莱州湾沿海地区盃形器均可以早到殷墟一期。也就是说，殷墟一期时商文化已经到达渤海南岸盐业遗址群内侧，这些遗址中的盃形器与同时期沿海盐业遗址群中盃形器形制完全一致，因而鲁北商文化在此时可能已延伸至渤海南岸地区。

鲁东南地区目前见到的商代遗存主要为调查资料<sup>[23]</sup>。调查简报刊布商代文化遗存54处，认为鲁东南地区晚商时期文化遗存一直均有分布。对此，燕生东等提出疑议，认为该地区未见殷墟二至四期遗存，文章所提到的晚商文化材料大部分早于殷墟二期，部分则进入西周早期<sup>[24]</sup>。鲁东南地区陶器以鬲、簋、盆为主，兼有少量罐、豆。陶鬲均残存高足，实足根较大且抹光；陶簋均为圈足，矮圈足且器底多下凹；豆盘为假腹豆盘；盆、罐多为口沿，时代特征不明显；这些器类与殷墟同类器相比，均显示其年代下限不晚于殷墟二期。调查简报认为属于殷墟三、四期遗址中，仅日照两城镇联合村、沂南南寨所发现高足为非实足根陶鬲，但高足足尖处呈“V”形深凹，分裆较高，与殷墟同时期陶鬲足尖处转角弧圆、分裆低矮的形制特征差异明显，这类器物的年代、性质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晚商文化在东南方分布的遗址可以到达苏北、皖中北地区，主要包括沭阳万北<sup>[25]</sup>、盐城龙岗<sup>[26]</sup>、连云港大村<sup>[27]</sup>、徐州高皇庙<sup>[28]</sup>、沭阳马墩<sup>[29]</sup>、洪泽施庄与土城<sup>[30]</sup>、贾汪焦庄<sup>[31]</sup>、凤阳古堆桥<sup>[32]</sup>、阜南台家寺<sup>[33]</sup>等。这些遗址的出现多与早商文化晚期的扩张关系密切，典型陶器年代下限可到殷墟一期，仅个别器物年代略晚。

随着早商二里岗时期商文化的扩张，殷墟一期时商文化在东方北部已经到达黄河三角洲与莱州湾沿海，最东可到淮河流域；中部鲁东南到达沭河流域，未能拓展到沿海地区；南部到达淮河南岸，并延伸到黄海之

滨<sup>[34]</sup>。也就是说,除山东半岛外,商文化占据了东方的绝大多数地区。殷墟二期后,晚商文化在东方的空间分布范围多有所收缩,尤其是在东南方。燕生东以殷墟三期前后段为界,将商文化后期在东方的发展分为两段。商文化后期前段,鲁北与沧州东部滨海平原成为商王朝唯一通向海洋的地方,东界北部从淮河流域退回至丹水两岸,中南部退回至古泗水流域西侧;商文化后期后段,东界北部未发生变化,南部重新占领古泗水河以东、沂水以西的地方<sup>[35]</sup>。可见晚商时期商文化在东方南部退出了苏北、皖中北为代表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大范围收缩;东方北部由淮河退至丹水、中部由沭河退至沂河,也略有收缩。

与空间上退缩相对的是晚商文化聚落在东方迎来了大发展。商文化后期前段,东方北部地区以盐业聚落为中心,沿海及内陆地区聚落遗址迅速增长(发现多达四五百处),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有序分布;南部豫东鲁西南地区聚落也发现超250处。商文化后期后段,东方地区聚落数量仍在增多,发展出以大辛庄、刘家庄、小屯、大郭、贤城、东安等为代表的高等级聚落,出现了苏埠屯、前掌大等超大型聚落<sup>[36]</sup>。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壮大所隐含的是人口的增多,但晚商文化在空间上却未能达到殷墟一期时的范围,令人深思。

## 二、从陶器文化因素看晚商文化在东方的变迁

聚落增加的背后是人口增多,期间文化的融合与更迭最容易体现在变化敏感的陶器上;同时陶器更能代表区域内大量中下层人群的文化认同,从而折射出文化潜在的发展趋势。故而,我们以东方地区晚商文化遗址可复原及完整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做动态分布考察。东方地区晚商时期陶器可以划分为两群:A群、B群。

A群:典型晚商文化器类。表现出来自晚商文化中心殷墟的因素,器形种类多样。

弧腹分裆鬲、鼓腹分裆鬲、侈口弧腹簋形制与殷墟墓葬同时期器类一致,演变趋势也相同,是晚商文化直接传入的结果,属于A群(图一,1~9)。以这三类器物形制演变为线索,可以将晚商东方地区陶器划分为四期,分别对应殷墟文化的四期。

直腹簋、束颈鼓腹簋与殷墟墓葬同类陶簋形制一致,如邹县南关H19:1<sup>[37]</sup>、昌乐东圈74:3<sup>[38]</sup>(图二,1、2)与殷墟大司空北M71:2<sup>[39]</sup>、戚家庄东M242:4<sup>[40]</sup>(图三,1、2)器形一致。两类陶簋流行于殷墟三、四期。

大型绳纹罐、球腹罐、折沿弧腹罐与殷墟同类陶罐形制一致,如济南大辛庄M1:4<sup>[41]</sup>、青州苏埠屯M8:91<sup>[42]</sup>、济宁凤凰台T5③:25<sup>[43]</sup>(图二,3~5)与殷墟大司空T1614M135:1、T1315M164:1、T0902H331:34<sup>[44]</sup>(图三,3~5)器形一致。大型绳纹罐在阳信李屋H46、苏埠屯M7中均有发现,年代跨殷墟一到四期;球腹罐在济南刘家庄M76<sup>[45]</sup>、苏埠屯M8中均有发现,流行于殷墟三、四期;折沿弧腹罐在济宁玉皇顶J1<sup>[46]</sup>中与A I式鬲共存,流行于殷墟一期。

尊形器、甗形器、卣形器与殷墟同类器形制一致,如平阴朱家桥<sup>[47]</sup>、苏埠屯M1:67<sup>[48]</sup>、济南刘家庄M76:2(图二,6~8)与殷墟安阳小屯76H72:21<sup>[49]</sup>、大司空T1418M303:178、郭家庄M203:9<sup>[50]</sup>(图三,6~8)器形一致。这三类器物从殷墟同类器形制看,属于殷墟三、四期。

深腹盆、浅腹盆、小型陶盆与殷墟同类陶盆形制一致,如济宁潘庙H55:18<sup>[51]</sup>及济南大辛庄6H43:1、11M21:2<sup>[52]</sup>(图二,9~11)与殷墟安阳小屯85H136:28、殷墟西区M267:5<sup>[53]</sup>、安阳小屯85H119:1(图三,9~11)器形一致。各类陶盆在东方地区各遗址中多有发现,从殷墟一期延续至四期。

分类 分期	A群				B群
	鬲		簋		豆
	A型	B型	A型	B型	A型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图一 东方地区晚商时期陶器分期图

1~6.鬲(6H133:1、J1:4、M23:2、M65:1、6T79④:1、M88:3) 7~11.簋(采集:52、M107:2、M56:5、M72:11、M80:1) 12、13.豆(H59:6、H547:25)(1、5、7、10、13.出自济南大辛庄,2、3.出自邹平丁公,4、8、9.出自济南刘家庄,6、11.出自章丘马安,12.出自济宁潘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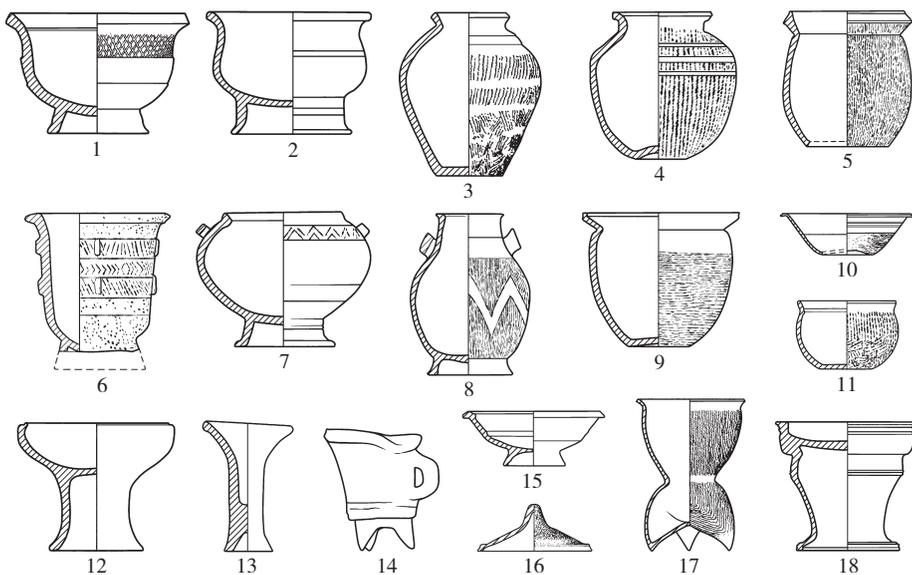
浅盘高柄豆、觚、爵、圈足盘、斗笠形器盖、甗与殷墟同类陶器形制也都基本一致,如章丘马安M111:2<sup>[54]</sup>、青州苏埠屯M7:21、M7:20、M7:30、M1:84、济宁张山洼H7:17<sup>[55]</sup>(图二,12~17)与殷墟小屯西GT112③:5<sup>[56]</sup>、郭家庄M1:18、M1:17、孝民屯NM179:5<sup>[57]</sup>、小屯西M1:91<sup>[58]</sup>、苗圃北PNH4:2(图三,12~17)器形基本一致。这些器物中除陶甗有带实足根与无实足根的形制差别,显示陶甗延续时间较长,其余器类多流行于殷墟三、

四期。

假腹豆与殷墟同类豆风格相近,如济南大辛庄11M1:2(图二,18)与涇北商城花园庄东T4③:1<sup>[59]</sup>(图三,18)风格相近,均属于殷墟一期。该类陶豆在大辛庄11M1、11M4<sup>[60]</sup>中与A I式鬲共存,年代为殷墟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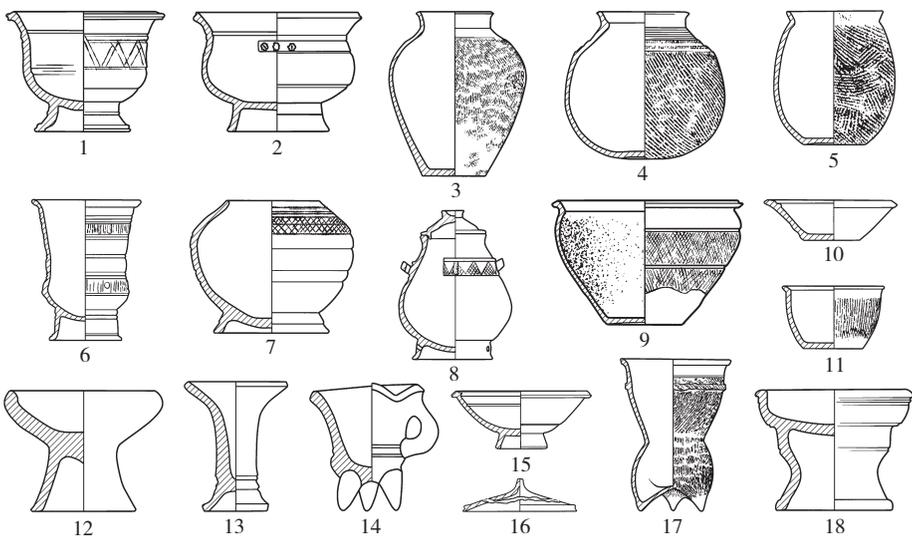
这些器类均能在殷墟找到同类器,是由殷墟直接传入的结果,且殷墟三、四期是相关器类传入的高峰时期。

B群:本地器类,分为两种。一种器类



图二 A群陶器

1、2.簋(H19:1、74:3) 3.大型绳纹罐(M1:4) 4.球腹罐(M8:91) 5.折沿弧腹罐(T5③:25) 6.尊形器 7.甗形器(M1:67) 8.卣形器(M76:2) 9~11.盆(H55:18、6H43:1、11M21:2) 12、18.豆(M111:2、11M1:2) 13.觚(M7:21) 14.爵(M7:20) 15.圈足盘(M7:30) 16.斗笠形器盖(M1:84) 17.甗(H7:17) (1.出自邹县南关, 2.出自昌乐东圈, 3、10、11、18.出自济南大辛庄, 4、7、13~16.出自青州苏埠屯, 5.出自济宁凤凰台, 6.出自平阴朱家桥, 8.出自济南刘家庄, 9.出自济宁潘庙, 12.出自章丘马安, 17.出自济宁张山洼)



图三 殷墟所出与A群同类的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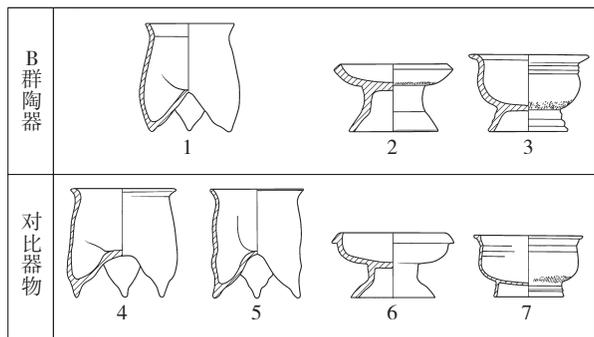
1、2.簋(M71:2、M242:4) 3.大型绳纹罐(T1614M135:1) 4.球腹罐(T1315M164:1) 5.折沿弧腹罐(T0902H331:34) 6.尊形器(76H72:21) 7.甗形器(T1418M303:178) 8.卣形器(M203:9) 9~11.盆(85H136:28、M267:5、85H119:1) 12、18.豆(GT112③:5、T4③:1) 13.觚(M1:18) 14.爵(M1:17) 15.圈足盘(NM179:5) 16.斗笠形器盖(M1:91) 17.甗(PNH4:2) (1.出自安阳大司空北, 2.出自安阳戚家庄东, 3~5、7.出自安阳大司空, 6、9、11.出自安阳小屯, 8、13、14.出自安阳郭家庄, 10.出自安阳殷墟西区, 12、16.出自安阳小屯西, 15.出自安阳孝民屯, 17.出自安阳苗圃北, 18.出自浞北商城花园庄东)

为本地融合多种文化因素而产生;另一种器类为直接继承早商文化且不见于殷墟。以鬲、簋、豆为代表。

弧腹高裆袋足鬲,形制受会泉庄与芝水二期遗存文化器类影响,如青州赵铺M1:2<sup>[61]</sup>受到昌乐后于刘H52:1<sup>[62]</sup>、龙口楼子庄H36:13<sup>[63]</sup>

(图四, 1、4、5)形制影响。该类鬲与AⅡ式簋共存,年代可早到殷墟三、四期。

侈口直腹簋、柄下部外侈的豆等器类形制风格明确,目前仅在海岱地区成序列出现,为本地演化产物,划归为B群(图一,



图四 B群陶器及相关器物对比图

1、4、5.鬲(M1:2、H52:1、H36:13) 2、6.豆(H547:25、M61:1) 3、7.簋(M1:2、ZBT2⑤:24)(1.出自青州赵铺,2、3.出自济南大辛庄,4.出自昌乐后于刘,5.出自龙口楼子庄,6.出自驻马店闰楼,7.出自郑州商城)

10~13)。方辉认为侈口直腹簋为夷式簋，流行于殷墟三、四期<sup>[64]</sup>。柄下部外侈的陶豆在大辛庄H547中与AⅡ式鬲共存，年代属于殷墟二期(图四,2)；此类器物数量不多，在豫南驻马店闰楼M53、M61中也有发现<sup>[65]</sup>(图四,6)，年代较海岱地区略晚。

浅腹陶簋直接源自早商文化同类器，如济南大辛庄M1:2<sup>[66]</sup>源自郑州商城ZBT2⑤:24<sup>[67]</sup>(图四,3、7)。这类器物年代下限可到殷墟一期偏早阶段。

上述两群器物以山东地区为核心分布区，我们在时间上以殷墟四期为标尺，空间上以鲁山、泰山为界，可将胶东半岛以外的地区分为鲁北、鲁南两大区域<sup>[68]</sup>。统计发现，A群陶器中，从殷墟一期延续至四期的器类，在整个东方地区均有分布，以弧腹分裆鬲、鼓腹分裆鬲、侈口弧腹簋为代表；殷墟三、四期才流行的器类主要分布在鲁北地区，如觚、爵、圈足盘、斗笠形器盖、大型绳纹罐、束颈鼓腹簋、尊形器、甗形器等；仅折沿弧腹罐(殷墟一期)、直腹簋(殷墟三、四期)集中分布在鲁南济宁、泗水一带。B群陶器中，豆柄外侈陶豆、浅腹直腹簋流行于殷墟一、二期，弧腹高裆袋足鬲、侈口直腹簋流行于殷墟三、四期。这些器类也以鲁北为集中分布区，尤其是弧腹高裆袋足鬲主要分布在青州一带，只有浅腹直腹簋

部分分布在鲁南的济宁-泗水一带。

殷墟一期后的东方地区，晚商文化空间分布范围缩小，但居址数量却在增加，尤其殷墟三、四期鲁北地区出现了大量高等级大型聚落。此外，殷墟三、四期的东方地区迎来了晚商文化陶器涌入的新高峰，分布区域也以鲁北地区为主，应与殷商重点经略该地区相关。与此同时，鲁北地区出现了B群陶器侈口直腹簋、弧腹高裆袋足鬲，可见此时鲁北地区不仅文化交流频繁，且区域文化自身特点已在逐步显露。

### 三、晚商东方区域文化特色

晚商时期东方地区以鲁北为中心出现B群陶器是晚商文化处于收缩势态下的一种自然趋势。结合晚商文化在北方、南方、西方的进退，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晚商文化在东方所表现出来的变化。

晚商文化遗址点在北方以河北定州北庄子遗址<sup>[69]</sup>为代表，外围分布着围坊三期文化，内侧紧靠豫北冀南王畿地区；西北方有晋中南灵石旌介<sup>[70]</sup>、浮山桥北<sup>[71]</sup>、闻喜酒务头<sup>[72]</sup>等高等级据点，外围分布着李家崖文化；西方外围分布着先周文化，南方收缩至豫南罗山天湖遗址<sup>[73]</sup>。晚商时期外围李家崖文化、先周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均处于发展、繁盛时期，给晚商文化在周邻区域的统治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李家崖文化(鬼方)对晚商西北方的统治造成了巨大威胁，传世文献屡见商王与鬼方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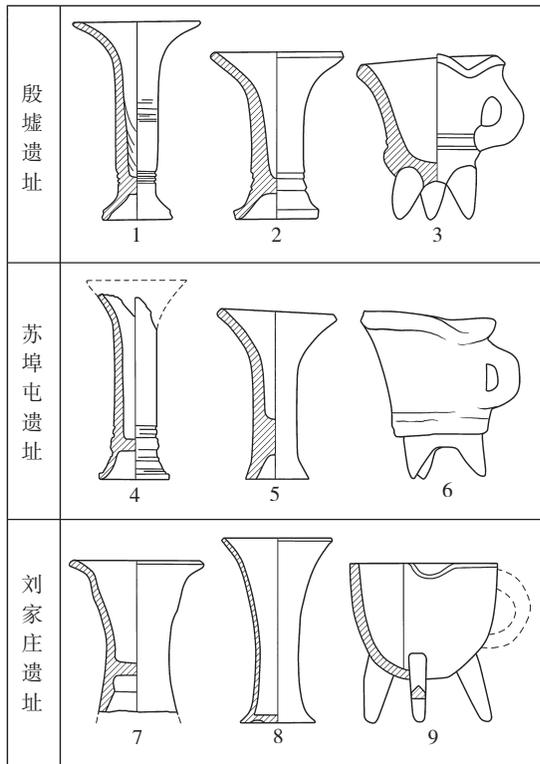
外围族群壮大的同时，晚商周邻地方类型也不同程度地孕育出自身文化特色。陶器文化因素上，罗山天湖遗址流行区域特色显著的弧裆器<sup>[74]</sup>。灵石旌介M1:25陶鬲的弧腹竖直，M2:4陶鬲为筒腹，瘪裆；浮山桥北M1:盗3陶鬲为深弧腹，裆微内瘪；这些均非典型殷墟文化陶鬲。闻喜酒务头只见罐、甗，不见其他陶器组合，M2出土陶罐为高直

领、腹部饰绳纹、肩部三角划纹有中轴线，显示出强烈的自身特色。从葬俗上看，这些遗址在与殷墟保持一致的同时，也有自身文化特色。从发掘报告及简报看，罗山天湖墓地青铜礼器髹黑漆、随葬工具的比例高；灵石旌介墓葬为一椁多棺合葬；浮山桥北大墓墓道随葬车马；闻喜酒务头大墓为“T”形墓、墓壁粗糙未修整等葬俗极具自身特色。关中地区老牛坡遗址则更为特殊，张天恩指出老牛坡遗址不是由殷墟文化发展起来的，与殷墟晚商文化有明显差别<sup>[75]</sup>；刘绪则认为其不属于商文化系统<sup>[76]</sup>。总之，正如部向平所言，商系墓葬中各地区墓葬在第Ⅴ阶段（殷墟三期）差异开始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来<sup>[77]</sup>。各地方类型与晚商文化中心的差异愈加显著。

晚商文化的收缩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空间范围上的收缩，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控制力上的衰退。后者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周边地方文化的崛起、壮大，与晚商文化形成竞争、敌对关系，如李家崖文化、先周文化；其二是地方文化类型的独立化，孕育出异于殷墟文化的自身文化特色，如周邻各地方文化类型。

晚商时期的东方地区独立性虽不及其他地区，但同样呈现出一定地方特色。如B群陶器中演化序列明确的侈口直腹簋。统计发现，侈口直腹簋以章丘马安、大辛庄遗址出土数量最多，且在鲁北东部地区遗址中多有发现，苏埠屯遗址M7：25陶簋形制也受其影响。这种现象说明鲁北东部地区文化间互动交流更为频繁，孕育出本地特色的“夷式簋”。此外，A群陶器中的觚、爵也很有指示意义。陶觚、爵罕见于殷墟以外的区域，只有青州苏埠屯和济南刘家庄墓葬<sup>[78]</sup>出土，说明二者同殷都关系相当密切，但两遗址之间陶觚、爵却存在一定的形制差异。

青州苏埠屯M1：68陶觚，喇叭口，口腹转折十分明显，腹部竖直且占器身比例



图五 殷墟、苏埠屯、刘家庄遗址出土陶觚、爵器形举例  
1、2、4、5、7、8.觚（T0507M105：1、M1：18、M1：68、M7：21、M109：17、M122：50）3、6、9.爵（M1：17、M7：20、M122：51）（1.出自安阳大司空，2、3.出自安阳郭家庄，4~6.出自青州苏埠屯，7~9.出自济南刘家庄）

很大（图五，4）；M7：21陶觚，整体器高变矮小，制作变粗糙（图五，5）；M7：20陶爵，低束颈，微流无尾，腹底器壁外侧微鼓，腹底所占器身比例很小，圜底近平，矮锥足，制作粗糙（图五，6）。苏埠屯M1、M7陶器年代最晚可到殷墟四期偏早阶段，陶觚、爵与同时期殷墟主流陶觚、爵形制完全一致（图五，1~3）。

济南刘家庄M109：17、M122：50陶觚，喇叭口，斜弧腹，形制规整（图五，7、8）；M122：51陶爵，无颈腹分界，微流无尾，斜弧腹，圜底，形制规整（图五，9）。与殷墟同时期陶觚、爵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自身地方特色。如M109：17陶觚器形矮胖、M122：50陶觚圈足极低、M122：51陶爵相较于文源绿岛M55：2器足更高等。

整体来看，殷墟KAM116：2陶觚、北徐家桥M458：1陶觚、殷墟西区M161：2陶爵形制接近刘家庄M109、M122所出陶觚、爵，但殷墟上述陶觚更加矮小、陶爵器足更低，是殷墟四期陶觚、爵制作粗糙化的产物，年代略晚于刘家庄遗址。

从青铜器铭文看，苏埠屯出土了大量铭铜器，黄组甲骨卜辞也见“小臣醜”（《合集》36419、36824）。李学勤认为源自甲骨卜辞小臣醜，且小臣醜参加了帝辛十祀征夷方的战事<sup>[79]</sup>。应该是商王派驻于东土的官员。刘家庄出土铭铜器可早到殷墟三期，殷墟出土铭铜器年代偏晚，或可说明殷墟所见族是由刘家庄迁入的<sup>[80]</sup>。整体来看，相较于济南大辛庄、章丘马安遗址，青州苏埠屯、济南刘家庄与殷墟关系异常密切，然而二者与殷商王朝关系似乎也有亲疏差别。从陶觚、爵形制及铜器铭文看，苏埠屯遗址与殷商王朝关系更为密切。同时，上述现象也体现出殷商王朝经略东方过程中，高等级人群的复杂性、多样性。

在葬俗上，晚商文化东方地区与商文化中心区一致性较高，仅有少量区域特色，如青州苏埠屯四条墓道的M1中使用“T”形腰坑。东方地区与商文化中心的差异更多体现在文化因素上，岳洪彬曾指出苏埠屯铜器形制、纹饰上存在地方特色<sup>[81]</sup>。济南刘家庄遗址发掘报告也指出，该遗址上层人群葬俗与殷墟基本一致，平民阶层人群中既有商文化因素，也有鲁北文化因素<sup>[82]</sup>。总之，晚商时期东方地区作为殷商王朝重点经略的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与殷墟关系更为密切，但部分遗址自身文化特色也在逐渐显露，尤其是在殷墟三、四期后，这一特点似乎也为殷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 四、征东夷与商王朝在东方的统治

与晚商文化在东方的发展、殷商王朝在

东方的经略直接相关的是商夷关系。关于东夷的地望问题，学界观点不一。董作宾认为在淮水流域附近<sup>[83]</sup>；郭沫若认为东夷泛指山东岛夷与淮夷<sup>[84]</sup>；王恩田认为在鲁南费县一带<sup>[85]</sup>；李学勤认为在潍、淄河流域<sup>[86]</sup>；孙亚冰综合各家观点后认为人方只是东夷的一支，在皖北淮河一带活动，并指出其被商王征伐后向东、向北退缩<sup>[87]</sup>。燕生东结合最新考古发现，认为东夷分布于胶莱平原、胶东半岛、鲁东南等地，文化面貌为岳石文化的后续文化会泉庄与芝水二期遗存<sup>[88]</sup>。结合孙亚冰与燕生东的研究成果，可知商代的东夷很可能是一个泛称，泛指与岳石文化及其后续文化相关的人群，郭沫若的认识可能更加符合实际。西周时期史密簋记载，西周中期南淮夷沿沂水北上，广伐东国，周王被迫派师俗、史密进行征伐<sup>[89]</sup>。尽管史密簋记载的是南淮夷入侵事件，但可知夷人的入侵具有很大流动性，对其征伐也与侵入地区有关而非固定地点。

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晋南地区商文化遗址衰落，与此同时商文化加强向东方、南方的拓展，学者认为与商王朝盐、铜资源来源的改变有关<sup>[90]</sup>，这一观点很有道理。但商文化的东进挤压了东夷人群的生存空间，导致商王朝与东夷爆发冲突，如《后汉书·东夷传》注引《竹书纪年》：“（仲丁）征于蓝夷”<sup>[91]</sup>，《太平御览》卷八三引《竹书纪年》：“（河亶甲）征蓝夷，再征班方”<sup>[92]</sup>等。商王朝控制鲁北盐业资源后，逐步强化对东方地区的经略。殷墟一期开始，鲁北地区聚落围绕盐业资源实现有序布局，发展出众多中心性聚落。殷商王朝在东方经略的成功，加剧了与东夷人群的矛盾。东夷始终处于时叛时服的状态，殷商王朝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东夷问题，如李发研究发现从师宾间类卜辞（武丁早期）到黄类卜辞（帝乙帝辛）皆有与征（东）夷有关的记载<sup>[93]</sup>。这一局面与东夷壮大有关，也与殷商王朝控制力衰退有关。《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武乙衰

敞”“东夷浸盛”“渐居中土”<sup>[94]</sup>。武乙时期商王朝势力衰退，东夷趁机侵扰东土，侧面说明东夷实力相对壮大。

从考古发现来看，殷墟三、四期时殷商王朝持续对鲁北地区经略，中心性高等级聚落数量增加。高等级聚落中族徽数量增多，且这些族氏多与殷墟及其周邻族氏有关<sup>[95]</sup>。这样的发展对于殷商王朝而言或许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东方的持续经略，不断地入力、物力输送，有助于实现对东方盐业资源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大量族氏驻扎东方也会造成殷墟的削弱。“东进”族氏短期内出现自身文化特色，似乎也暗示着远离殷墟加速了其与中心王朝的疏远。

此外，鲁中南、鲁西南聚落的发展尚需再做梳理。殷墟三、四期时，古泗水河流域东侧的聚落再次增多，众多遗址中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遗址的出现可能与商末征东夷有关，部分也可能与周初分封有关，因遗址出土铜器形制偏早，而导致年代认识偏早。殷墟三、四期时，商王朝为阻止东夷从鲁西南入侵殷商东土而增设据点，晚商时前掌大聚落的繁盛即与此相关。周初周王朝东封，殷遗贵族将商末铜器携带至此，促成众多遗址出土商末周初铜器，如李宏飞认为前掌大部分墓葬出土铜器属于“殷遗系铜器群”<sup>[96]</sup>。但具体遗址时代、性质的判定，还有赖于更多典型陶器的发现。苏北铜山丘湾遗址晚期遗存由商末改定为西周时期<sup>[97]</sup>，也说明陶器材料的新发现及细致分析，这对准确认识相关遗存至关重要。

附记：本文是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商周陶器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1G009）、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三水河流域商周时期文化格局与聚落结构研究”（项目编号23JP16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黄土高原与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26）的阶段性成果。

## 注 释

- [1] 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见《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 徐基：《商文化东渐初论》，《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 [3] 张国硕：《从商文化的东渐看商族起源“东方说”的不合理性》，《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 [4] a.高广仁：《海岱区的商代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b.邵望平：《商王朝东土的夷商融合》，见《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c.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见《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
- [5] 曹斌：《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动——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东岳论丛》2006年第11期。
- [6] 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见《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 [7] a.燕生东、丁燕杰：《商文化前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特点》，《中原文物》2016年第6期。  
b.燕生东：《商文化后期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见《海岱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
- [8]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
-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29~3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 [10] 王立新：《早商文化研究》第102~12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11]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 [12] 本文所指殷墟一期包含邹衡所划分的第四段第Ⅷ组，年代上限到盘庚小辛小乙，下限到武丁早期。
- [13] a.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课题组：《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遗址2007年调查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  
b.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第70~73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 c.李水城：《中国盐业考古》第300~314页，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
- [14] 沧州地区文管所：《孟村回族自治县高窑庄遗址调查简报》，《文物春秋》1993年第3期。
- [1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3期。
- [16] 滨城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 [17]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县文化局：《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
- [18] 燕生东等：《桓台西南部龙山、晚商时期的聚落》，见《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 [19] 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倪杨屯商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3年第2期。
- [20] 同[13]b。
- [21] 沿海盐业遗址群以盃形器为主，日用陶器极少；内陆腹地聚落以生活器为主，盃形器占比极少，不足5%。
- [22] 同[13]b。
- [23] 刘延常等：《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见《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 [24] 参看[7]a文章中注释18。
- [25] 谷建祥、尹增淮：《江苏沭阳万北遗址试掘的初步收获》，《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 [26] 韩明芳：《江苏盐城市龙冈商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9期。
- [27]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新海连市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勘察记》，《考古》1961年第6期。
- [28]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 [29] 江苏沭阳考古队：《淮阴沭阳县考古调查》，《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 [30] 尹增淮、裴安年：《江苏洪泽县考古调查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 [31] 原丰：《徐海地区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见《淮海文博》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32]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凤阳县古堆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4期。
- [33]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
- [34] 同[7]a。
- [35] 同[7]b。
- [36] 同[7]b。
- [37]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邹县南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 [38] 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商周文化遗址调查》，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 [40]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106、10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 [41] 任相宏：《济南大辛庄龙山、商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8期。
- [4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辑。
- [43]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凤凰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上）第46、51、73、329、406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5]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46]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济宁市任城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济宁市玉皇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4期。
- [4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 [4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100、105、125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2004年。
-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20、3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51]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2期。
- [52]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见《东方考古》第4集。
-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54]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马安遗址的发掘》,见《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 [55] 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室、济宁市任城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济宁市张山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9期。
-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137、142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第405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9期。
-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60]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
- [61] 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见《海岱考古》第一辑。
- [62] 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物管理所:《昌乐县后于刘遗址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 [63] 烟台市博物馆、龙口市博物馆:《龙口市楼子庄遗址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十一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64] 方辉:《商周“夷式簋”的传播与族群变动》,《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
- [65]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閼楼商代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4期。
- [66] 同[41]。
- [6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4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 [68] 本文所指鲁北主要包括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滨州、东营、潍坊的青州和寿光等地,鲁南采用相对广义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济宁、枣庄、临沂以及菏泽、日照等地。
- [6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定州北庄子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 [7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第13、87、93、135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71] a.田建文:《初识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4年第21期。  
b.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见《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 [72] a.白曙璋:《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晚期墓地》,《大众考古》2019年第2期。  
b.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
- [73] a.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b.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 [74] 李晓健:《罗山天湖商代墓葬再研究》,《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
- [75]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第15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 [76] 刘绪:《夏商周考古》第6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 [77]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278~28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78] 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
- [79] 李学勤:《重论夷方》,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 [80]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
- [81]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3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 [82] 同[45]。
- [83] 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三·帝辛日谱，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
- [84] 郭沫若：《卜辞通纂》，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
- [85] 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见《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 [86] 李学勤：《论新出现的一片征人方卜辞》，《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
- [87] 孙亚冰：《甲骨文中的人方》，见《东方考古》第4集。
- [88] 燕生东：《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 [89] 张永山：《史密簋铭与周史研究》，见《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90]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 [91] 《后汉书·东夷列传》第2808页，中华书局，1965年。
- [92] 《太平御览》卷八三第391页，中华书局，1960年。
- [93] 李发：《殷卜辞所见“夷方”与帝辛时期的夷商战争》，《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第140~149页，中华书局，2018年。
- [94] 同[91]。
- [95] 同[7]b。
- [96] 李宏飞：《试论殷遗系铜器群》，《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
- [97] 李宏飞：《试论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兼论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刘昶）

## ○信息与交流

# 《宝鸡旭光墓地》简介

《宝鸡旭光墓地》由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本书为大16开精装本，正文329页，图版167页，定价580元。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2018~2020年在宝鸡旭光墓地发掘了75座先周、西周、东周墓葬，1984年在同一区域清理出另外2座西周墓葬，共计77座墓葬。先周、西周时期这里是一处公共墓地，墓葬以台地的中脊为中心向东西两侧排布，其中以西周早期墓葬占绝大多数，是该墓地对应聚落的繁荣期。47座

西周墓葬自南向北可分4个墓区，每个墓区都有1座规格较高的墓葬，墓主可能是该区域的中心人物。28座东周墓葬中，27座为秦文化墓葬，1座为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狄文化）特征的墓葬。

该报告详细公布了此次发掘的全部材料，在应用传统考古学方法的基础上，借助多学科手段整理、分析了这批材料，附录收录了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报告为认识该区域周秦时期社会面貌、跨区域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信息。

（佚名）